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本刊特约相关专家学者撰稿,全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40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成果,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书写改革开放的时代新篇章!

中国改革开放起点问题再认识*

胡安全 宋曲霞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 241002)

摘要:改革开放的起点实质是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实践逻辑起点的统一,它既揭示了改革开放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又开启了改革开放一以贯之接力探索的历史进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起点,就是因为它既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作出了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问题的重大决策,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建立由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传扬的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伟大传统,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前进。

关键词:改革开放;起点;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6-0011-006

DOI:10.16064/j.cnki.cn34-1003/g0.2018.06.002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问题,学者多有研究,涉及改革开放的酝酿、发端、启动、起始条件等,成果斐然。^[1]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开启的标志,学界已经形成共识。问题是,改革开放实际上存在较长的历史渊源,经历过多次改革尝试^[2],为什么是三中全会而不是别的事件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起点的实质是什么?这需要继续探讨。

一、改革开放原来可能的三个起点及其启示

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起源较早,但其尝试可谓一波三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它经历了至少三轮:

第一轮自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和中共八大开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前后,毛泽东就有了开放的思想。1956年5月,他在广东听取陶铸等汇报计议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贷款来发展生

产时指示: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海外的游资那么多,可以利用嘛。^[1]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3],开始思考并提出“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2]53}。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地方、生产单位、生产者相对于中央、政府、生产单位应有一定的自主权,以调动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个体私营经济、自由市场应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以补充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不足,活跃社会主义经济。这些思考显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突破苏联模式的勇气。不过,毛泽东等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毛泽东说:“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2]29}讲地方独立性,“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2]56}。刘少奇谈到发展私营经济时说:“现在要通过什么决议,颁布什么法律,还为时过早。”^{[3]326-327}对适度发展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陈云说:这会带来一些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KS04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SK2016SD30)

作者简介:胡安全(1962—),安徽芜湖人,博士,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宋曲霞(1963—),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和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新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必须慎重从事”。^[4]限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谨慎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认识上的疑虑使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初步的改革尝试没有能够持续下去。

第二轮自1961年全党“调查研究”和调整经济开始。1959至1962年是共和国困难的岁月,当时一些人已经认识到内地与香港的差距。《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连云山1962年夏秋之交深入深圳边境和香港九龙后,写了建议在深圳边境一带建立“特别政策优惠区”等4篇内参给中央。他回忆说:“这次香港之行让我第一次知道了香港是如何的先进和自由,知道了两地经济的巨大差距,把我头脑里的概念全颠覆了。”^[4]面对困局,1961年1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中央领导在调研中提出了若干改革计划工作和经济体制等新思路和新做法:第一,改革农业计划,解决农业生产困难可以包产到户。1961年7月,谭震林等向中央呈报《建议对农业计划工作实行根本改革的意见》,提出:“直接用国家农业生产计划来指导生产队的生产(直接计划)是不应该的,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国家应该也只能通过农产品收购计划(间接计划)来实现对社、队农业生产计划的指导。”^[5]他认为,把直接计划改为间接计划是“一个重大的改革”。^[6]这些意见在1962年农业规划工作中开始得到体现。当时,安徽等地对农村改革进行了大胆尝试,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的肯定。第二,学习外国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63年10月,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3]527}他认为,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的做法是“超经济的办法”^{[3]528},并提出“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3]528}。李富春在制订“三五”计划时注意到了经济体制问题,他说:“我们现行的各项体制、基本建设管理和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受苏联的影响较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7]345}他主张“立即着手研究有关计划体制、管理体制、财务体制、劳动体制、基本建设管理和各项规章制度方面的问题”^{[7]345}。李先念在1964年全国财政会议和银行会议上提出:“凡是束缚生产力,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东西……要坚决地改,彻底地改。”^[8]这一轮改革尝试随着“文革”的爆发而被打断。

第三轮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进程,中国与发达国家交往愈益增多,有关经济和科技领域差距过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周恩来主张认真学习别国的长处。^[5]1975年1月以后,邓小平逐步主持国务院、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提议并设立了国务院研究室,与成员进行了24次谈话,就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等问题阐述了新观点,为改革开放试验提供了思想基础。他强调,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对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9]83}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肯定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必要性,认为:“‘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必须把体制改革工作坚持进行下去。”^{[10]151}8月8日,在听到胡乔木说现在很多企业实际上实行的是“党委书记一长制”时,他指出:“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10]41}他倾向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邓小平领导了一场后来他称为改革试验的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11],得到了周恩来等的高度评价。1975年10月以后,随着邓小平“靠边站”,全面整顿被迫停止。

改革开放原来可能的起点至少有三个,可惜都半途而废。究其原因,限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毛泽东等当时对改革尝试是担心的。他把这一担心归结为“走什么路”的问题,主张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一个可以作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开端的内涵丰富的标志性事件,如第二、三轮改革尝试;二是在发出改革号召以后,缺乏有高度的理论洞察力和强大的实践推动力的领导核心及领导集体来不断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三轮尝试都存在这一情况。

因此,改革开放的起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有一个内涵丰富的标志性事件可以作为开端;第二,改革开放事业能够始终坚持和丰富发展,其历史进程没有半途而废。如果只有一个开端,虽然它提出了改革开放课题,在理论上破了题、开了头,但实践进程未能延续下去,缺乏相应完整的历史进程,那这个开端只能是断了线的源头,而不是

真正起点。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 改革开放内涵丰富和意义深远的历史开端

从改革开放的视角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极为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和内涵,中共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其“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12]673}。

邓小平是最早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历史地位的领导人。他指出,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13]82}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首次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并用了“坚定地沿着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前进”^{[13]542}的表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肯定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4]821},认为三中全会以来,党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14]839}。此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表述愈益广泛,至1987年年初成为全国人民“最亲切的政治概念”^[15]。十四大报告首次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6]4}十四大修改党章,固化了这一认识成果。^{[16]51}自此,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完全确定了下来。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首次举行纪念大会^⑥,江泽民全面阐述了全会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幕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2]673}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等三大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7]5}。习近平强调: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8]。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开端的标志性重大事件,它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和价值是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而逐步被人们认识的,是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三中全会的内涵和价值,今天看来,至少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从历史角度来说,它是中共20多年来指导思想正确趋向与错误趋向最后“和平交锋”的胜利成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文革”前10年的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即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两个趋向“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19],由于思想根本对立,所以相互之间时常发生矛盾,甚至出现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两个趋向在“文革”期间仍在延续,错误趋向大多时候占据上风。“文革”以后,经过呼吁与阻挠邓小平复出、反对与坚持“两个凡是”、支持与否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进与干扰冤假错案的平反等短兵相接的“和平交锋”,正确的发展趋向终于在党中央占了上风,邓小平等终于成为中央决策层的核心人物,改革开放政治力量终于占据领导地位。

第二,从时代和人民角度来说,它是发达国家、地区先进科技经济的压力和中国人民求变求富的强烈愿望等因素聚合并影响的结果。外部压力和人民愿望等因素的聚合和影响,促使了改革开放强大动力的形成。一方面,时代性是改革开放发生的环境条件,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很多是由时代提出来的。三中全会之前,通过大出访,中共领导层深深地感受到时代进步的潮流,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经济的先进,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如何适应和推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如何在新的时代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和解决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人民性是改革开放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根本目标。通过“天安门事件”、“大逃港”、知识青年回城等,中共感受到了人民求变求富的强烈愿望。这些愿望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共识。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基础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共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她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安康。

第三,从会议自身角度来说,它初步总结了历史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做出了“道路性”的重大决策,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揭示了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和演变逻辑。十

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3]三中全会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决定工作中心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全会充分肯定了过去改革的尝试，特别是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全会认为：全面整顿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13]全会明确提出以改革和开放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会把“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3]等做法称作“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13]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全会把改革看作一场革命，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3]全会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在过去发挥“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勃地发展起来”^[13]。这些论断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要素和演变逻辑。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时代性、人民性和规律性，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使其无可置疑地成为改革开放的开端。

三、中共改革开放

“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传统的形成和传扬

开端并不等于起点。没有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传统的形成和传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可能成为改革开放真正的起点。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0]“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是中共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并传扬的传统，其含义是

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集体接续不断地坚持改革开放，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几代领导集体建立、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路线始终坚持、丰富发展和关键时刻的力挽狂澜，是三中全会成为改革开放起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传统的建立者。他多次谈到改革开放是一种探索和试验，“搞改革就是一种探索，探索需要勇气”^[9]，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9]。他极为珍惜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反复阐发坚持基本路线的核心要义和重要性。1985年7月，他会见外国客人时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了一条新路，“所谓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开放和改革要坚持到底，不会变，“变，就没有出路”^[9]。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对第一线领导人叮嘱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9]苏联“8·19”事变次日，他同中央领导谈话时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9]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谆谆告诫、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1]

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总书记以后，明确表示，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22]新阶段的改革，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23]。邓小平去世后，他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23]江泽民强调了继续探索的必要性。1998年1月，他指出：邓小平指明了前进方向，奠定了发展基础，今后的路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23]。2001年8月，他在调研时指出：“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大量的新情况新挑战？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找。”他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继续前进，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也要继续下去，永远不能停顿。”^[24]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后,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接力探索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2003年7月,他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25]。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指出:“探索、认识、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6]^[61]必须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艰辛探索中前进,“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26]^[62]。他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17]^[9]。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他充分肯定了历代领导集体“接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17]^[90]的历史意义。

中共十八大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和反复强调一以贯之、接力探索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多次表明和不断宣示一以贯之、接力探索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多次阐明和深刻揭示一以贯之、接力探索改革开放的丰富内涵。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改革开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快速发展的意义,强调:在中国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27]。2012年年底,他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改革开放是长期、艰巨和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28]。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他提出:“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29]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30]。他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和讲话,清晰地显示出中共在新时期已经形成并

传扬了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的伟大传统。纵观四十年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很少一马平川、一帆风顺,坎坎坷坷,几次面临动摇甚至中断的危险。幸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力探索,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前进。

综上所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揭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它是中共历代领导集体对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路线的始终坚持、丰富发展和关键时刻的力挽狂澜,形成和传扬了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的伟大传统。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推进的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为指向的、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任务的一场快速而有序的革命性变革。中国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揭示的改革开放理论逻辑的引领,需要按照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实践逻辑继承和发扬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传统,推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滚滚前进。这一传统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新传统。在中共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已经并正在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共同的伟大探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越来越彰显其不可动摇、无可比拟的地位和意义。

注释:

(1)代表性论文主要有:李向前《中美建交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武国友《新时期历史转折需要进一步厘清的几个认识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黄一兵《一九七八年前后“纲”的转移问题研究——以党的政策思想转变和调整为主线》,《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李正华《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韩钢《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关海庭《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政治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等。

(2)见胡安全、宋曲霞:《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源》,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毛泽东指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页。周恩来在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批评了关门搞建设的想法。他指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84页。
- (4) 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载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6页。
- (5) 当时有医学、科学家两个代表团出国参观考察,回来后都没有做报告,原因是“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周恩来针对这一情况明确指出:“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1页。1971年12月,他在听汇报时说:“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01,502页。
- (6) 三中全会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没有举行大的纪念活动。

参考文献:

- [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2004年9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64.
- [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刘少奇.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4] 陈宏.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6.
- [5] 转引自:谭震林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331.
- [6] 谭震林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330.
- [7] 李富春.李富春选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 [8] 李先念.李先念文选(1935—198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90.
- [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0]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程中原,执笔.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1]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57.

- [12]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5]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261.
- [16]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7]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18]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4-14(02).
- [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胡绳,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06.
- [2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 [2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 [22]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7.
- [23] 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2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7.
- [2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76.
- [26]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27]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
- [2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 [EB/OL]. 新华网 2013-1-1.
- [29]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5.
- [3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 [3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1-6(01).

(责任编辑 吴勇)